清史纂修

“大清”国号词源研究

张雅晶

天聪十年（1636）四月十一日，金国汗皇太极更改国号，满文作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，[①]汉文为大清。从此历朝沿用，直至辛亥鼎革、清帝逊位。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“大清”？这个国号包含何等特殊的象征意义？自上世纪初叶，中外治清史者潜心研究，各抒己见，有关论著相继问世。然而，迄今尚无共识。究其原因，在于没有确定此国号源自何种语言，或认为满语，或认为蒙语，或认为汉语。显然，要想阐明此国号的意义，必需先澄清其词源。有鉴于此，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、“满语说”之虚妄

大清是满洲人建立的。因此，有些学者自然从满语、满文出发，探讨其国号的来源及意义，然而多不得要领。

例如：市村瓒次郎于 1909 年发表《清朝国号考》一文，认为：“金和清的北京音是稍微相近的，金是 chin 的上平声，清是 ching 的去声。北京人很准确地区别这两个字的发音，但外国人很容易混淆。所以，很难相信当时女真民族能正确地区别汉字的发音。金的国号改为清，或许取决于音调的相似。”继而又认为：“总而言之，金改为清，只是字形的变更，发音并没有彻底改变。”[②]显然，市村的说法自相矛盾，且金字拟音不准。

又如：金梁于 1933 年出版《光宣小记》一书，其“大清”条云：“惟大清二字，论者多以为疑，而不知清与金为一音之转。”又云：“字面虽易，在满音原无异也。”[③]其“后金”条云：“奉天东门曰抚近，额题大金天聪年。余即赴省拓得数本。其满文则与后作大清字样者，文字全同。清金同音，足为余前论之确证矣。”[④]其实，金梁虽为满人，但“不解满文满语”，[⑤]所言皆荒诞不经。

［收稿日期］2014－03－12
［作者简介］张雅晶（1960—），女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，北京 100101；zhangyj55@ eyou. com

① 本文行文中出现的满文、蒙古文，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语言学会监制、乌鲁木齐市索贝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《索贝特_ 锡伯文满文输入法》（V1.0 版）录入，采用“锡满古风”字体，并横排以便排版。其后面括号内注明读音，依 P · G · von Möllendorff（穆麟多夫）氏 *A Manchu Grammar*（满洲语法）转写法，以拉丁字母转写。引文则一仍其旧。满文材料的使用，得到赵志强研究员的帮助，谨此致谢。

② 市村瓒次郎：《清朝国号考》，《支那史研究》1943 年，第 485 页。

③ 金梁：《光宣小记》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第 7、8 页。

④ 金梁：《光宣小记》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第 161—162 页。

⑤ 金梁：《光宣小记 · 满洲语》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第 164 页。

当时许多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在不通晓满语、满文的情况下，都为市村和金梁的虚妄之说所迷惑，甚至个别研究清史的大家也不幸被欺骗。孟森绍述市村之说，坚信“金之为清，改汉不改满”，并以金梁所言为“确证”,① 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。有的学者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，如萧一山先生认为：“按金梁于满文并不精通，观其译《满洲老档秘录》可知，金清谐音之说，虽不无理由，然改汉不改满之说，尚待考。因抚近门额系天聪年立，其时尚未改大清也。”②

后来，对于市村之说，中山八郎斥其荒唐，并指出：“在满文中，金和清的发声和韵尾是不同的，c 和 j 或 g、ng 和 n 的写法有区别。”并认为：“金与清不仅字形有区别，而且发音也没有关联。”③ 这无疑是正确的，当时在满语中能分辨金与清的不同发音，满文（jin）与（cing）的字形也颇不相同。对于金梁的沈阳抚近门额上与大金对应的满文为“大清”的记述，山本守特撰《关于抚近门的扁额》一文加以批驳,④ 松村润也认为“事实上金梁的记述，是错误的，这正如山本守所报告的那样”。⑤

令人遗憾的是，所谓音近、同音以及谐音、转音之说，迄今并未绝迹。李治亭主编的《清史》颇有新论，而对于大清国号仍沿袭了市村、金梁的旧说，称：“‘清’与‘金’字为转音，实际上是以汉字的发音为基础，改换一个发音相似的汉字而已。‘清’与‘金’字发音相近。当然，从音韵学上看，‘清’字是属庚韵，‘金’字属侵韵。但皇太极及诸贝勒、大臣改‘金’为‘清’，不会作这种音韵学上的研究，只求两个字音近罢了。”⑥ 这实在是智者千虑之一失。至于在互联网上，类似的说法更是不胜枚举。

有鉴于此，在这里还有必要再强调如下三点：

一是，在满语中，（jin）和（cing）都是常用之音，可以出现在词首、词中和词尾，两者读音并不近似，更没有同音、谐音或转音关系；在满文中，两者的形体更有明显的区别。例如：（jinjima）贼豆卷；（donjinjimbi）来听（问）；（banjin）生相、生计；（cinggiya）匾浅；（hacingga）各样；（cang cing）钟磬声。⑦ 由此可见，在满语、满文中，“清”与“金”是不可能相混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，与当时满洲人懂不懂音韵学没有关系。

二是，作为国号的金，当时在满语中称为（aisin），汉译为金，故汉语中取其词义称为金，或作大金。这一国号，在满洲入关前记录政务而形成的满文档案中就屡见不鲜，据统计，“《旧档》中见金（aisin）和金国（aisin gurun），而其意又是作国号用的近九十处”⑧。而作为国号的大清，当时在满语中称为（daicing），“这在《满文老档》之中，也必定写做 daicing gurun，而 cing gurun 的记载是没有的”。⑨ 显然，满语 aisin（金、大金）与 daicing（大清）的读音与词形都是不一样的。主张满语说者不比较这两个有差别的国号，却热衷于探讨汉字“金”

---

① 孟森：《明清史讲义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387 页。

② 萧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（上卷）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187 页。

③ 中山八郎：《关于清的国号》，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编：《中国史研究》（三），1963 年。

④ 山本守：《关于抚近门的扁额》，《东洋史研究》，1937 年。引自松村润《大清国号考》，王桂良译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7 年第 1 期。

⑤ 松村润：《大清国号考》，王桂良译，《杜会科学辑刊》1987 年第 1 期。

⑥ 李治亭主编：《清史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304 页。

⑦ （乾隆）《御制五体清文鉴》卷 28，杂粮部，米谷类；卷 12，人部第三，聆会类；卷 11，人部第二，容貌类；卷 11，人部第二，富裕类；卷 17，人部第八，懦弱类；卷 18，人部第九，完全类；卷 14，人部第五，声响类。

⑧ 薛虹、刘厚生：《〈旧满洲档〉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90 年第 5 期。

⑨ 松村润：《大清国号考》，王桂良译，《杜会科学辑刊》1987 年第 1 期。

与“清”在满语中的读音，有失偏颇。

三是，作为国号的（daicing）不是满语固有词汇。查阅（康熙）《御制清文鉴》、（乾隆）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、《大清全书》、《清文汇书》、《清文补汇》等清代官私辞书，都没有收录（daicing）一词，没有收录任何一个词根为 -（daicing -）的词汇。这说明它不是满语的固有词汇，作为国号的（daicing）并非源于满语。换言之，满语中作为国号的（daicing）是个外来语，即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用的词语。因此，探讨大清国号的词源，毋庸再拘泥于满语。

二、“蒙语说”之空泛

有些学者认为“大清”国号源于蒙古语。例如，鲍明在《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》一文中就推测说：“‘大清’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，也不是满语固有词，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，即‘代青’（daicing）。因此，大清国的意思应为‘上国’（‘至高无上之国’）或‘善战之国’。”[1] 又如，欧立德说：“如果看满文资料的话，会发现‘大清国’的满文是‘Daicing gurun’，‘gurun’就是国，‘Daicing’是战士的意思，大清国就是战士国，这个词来自蒙语。”[2] 客观而言，“蒙语说”空论有余而实证不足，略有牵强之嫌。

首先，“蒙语说”论述满蒙词语的异同过于武断。除了泛泛的推论之外，“蒙语说”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满文（daicing）与蒙文（daicing）的写法、发音相同。其实，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发音相同，写法相近。由于满语和蒙语都是阿尔泰语系所属语言，满文又源于蒙文，因而写法、发音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为数不少。然而，也有许多例外情况，如满文和蒙文的（ali），字形、读音都相同，但意义不同，在蒙语中是指示代词“那个”，而在满语中则是动词（alimbi）的命令式，意为“擎”。[3] 再如满文（keremu）与蒙文（keremu），读音相同，字形相近，而意义毫不相干，在蒙语中意为“灰鼠皮”，而在满语中意为“城垛口”。[4] 显然，仅凭满文（daicing）与蒙文（daicing）读音相同、字形相近这一点，还不能说两者必定存在意义关联。

与之相关，属于不同书写系统的民族语言词汇，如果发音相同，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意义上存在某种联系。譬如，满汉文字属于不同书写系统，满文（daicing）与汉文“大清”写法各异，但读音相同，因此不能排除意义上有所联系。另外，古代国号中的“大”字，无论汉语正确读音为何，满洲人读作（dai）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四月十五日，即“大清”国号产生后数日，在大清国汗致朝鲜国王的文书中，出现（daiming）即大明 6 次、（dailio）即大辽 2 次、（dai yowan）即大元 2 次。[5] 据此推断，满文国号（daicing）未尝不是汉文“大清”的音译借词，而难定是蒙语“代青”的音译借词。至于其写法和发音与蒙语相同，实属巧合，亦未可料。

有人认为：“‘代青’在蒙古文中写 daicin，又作 daicing，该词借入满文中，与‘大清’的

---

① 鲍明：《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》，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 年第 2 期。

② 盛韵：《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》，《东方早报 · 上海书评》2013 年 6 月 2 日。

③ （乾隆）《御制五体清文鉴》卷 18，人部第九，尔我类第二；卷 21，居处部第三，倒支类。

④ （乾隆）《御制五体清文鉴》卷 24，衣饰部，皮革类第一；卷 19，居处部，城郭类。

⑤ 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，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，2006 年，第 124—130 页。其中，第 129 页所见 dai yowan，在辅音字母 n 的右边有一点。

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；变为加圈点满文后，则与‘大清’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。”① 在这里注意两点：（1）蒙古文中 daicin 与 daicing 似乎有点区别。据《蒙汉词典》解释：“ daičin ［dæ：ʧin］〔形〕战斗的，尚武的，善战的。”而“ daičing ［dai ʧiŋ］〔名〕〈史〉大清：～ 大清国。”② 从中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，且“ daičing ［dai ʧiŋ］”仅此一条，似乎是一个满语借词，而不是蒙语固有的词汇。（2）关于该词与新老满文“大清”的阐述，显得缺乏历史常识。事实上，满文的改进在先，国号的改变在后。因此，在无圈点满文史料中，借自蒙语的（daicing），汉语作代青或戴青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用作“大清”国号。查阅《满文原档》可知，满文“大清”国号凡见 11 次，均以加圈点满文书写，详见下表：③

日　期	出　处	国　号
崇德元年五月十九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206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六月十一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256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326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九月二十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449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九月三十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468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503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680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681 页	(daicing)
崇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	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第 711 页	(daicing)

另外，满文属于拼音文字，因此（daicing）既可对应于汉语“大清”国号，又能对应于蒙语“代青”或“戴青”封号以及人名用语。这种情况，在清朝入关前后的满文档案文献中俯拾皆是。至于某人原先封号中有（daicing）一词，后来改封他号时没有（daicing）一词了，可另当别论。

其次，“蒙语说”论述满语（daicing）的书写形式有失偏颇。“蒙语说”认为：“大元（daiyuwan）与大明（daiming），二者虽有时亦连写，但依历史资料，皆为汉语合成词，为偏正词组，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，简称为‘元’、‘明’以后，仍然有意义。而‘大清’则不同了，其满文为连写（daicing），而不是分开书写的，即如 dai cing，也不是 da cing。这表明‘大清’不是由独立的‘大’字和‘清’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，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。故‘大清’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。”④ 客观而言，满语（daicing）国号一般不分开书写，这或许与女真（满洲）人曾经借用蒙语（daicing）一词有关系。

不过，从清代文献来看，满文（daicing）非但可以分开书写，而且“大”字还用满语的形容词（amba），汉译为大。例如：满文本《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ben gi bithe》即《太祖高皇帝本纪》“凡例”首行文字为（amba cing gurun i ben gi bithe i šošon kooli），意为：大清国本纪凡例。其上卷首页第一行文字为（amba cing gurun i ben gi bithe），意为：大清国本纪。下卷首页第一行文字为（amba cing gurun i ben bithe. fejergi debtelin），大清国本纪，下卷）。而其上卷末页则作（daicing

---

① 鲍明：《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》，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 年第 2 期。

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：《蒙汉词典》（增订本）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124 页。

③ 《满文原档》第十册，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，2006 年，第 206－711 页。

④ 鲍明：《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》，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 年第 2 期。

gurun i fukjin ben gi i bithe. dergi debtelin），意为：大清开国本纪，上卷；下卷倒数第三页则作 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 ᡳ ᡶᡠᡴᠵᡳᠨ ᠪᡝᠨ ᡤᡳ ᡳ ᠪᡳᡨᡥᡝ ᡶᡝᠵᡝᡵᡤᡳ ᡩᡝᠪᡨᡝᠯᡳᠨ（daicing gurun i fukjin ben gi i bithe fejergi debtelin），意为：大清开国本纪，下卷。① 显然，在上引各句中，ᠠᠮᠪᠠ ᠴᡳᠩ（amba cing）即大清，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亦即大清，其中ᠠᠮᠪᠠ（amba）应为汉语“大”字的意译，而ᠴᡳᠩ（cing）应为汉语“清”字的音译（关于这一点，详见后述）。

另据《国立北平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》记载，北平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所藏满文书籍中，有《世祖章皇帝本纪书》，满文题名为“shitzu eldembuxe xoewangdi i ben gi bithe”，“存一册，一卷，钞本”；《圣祖仁皇帝本纪书》，满文题名为“shengtzu gosin xoewangdi i ben gi bithe”，“存一册，一卷，稿本，存卷十九”。② 从满文题名中使用汉语借词“ben gi”（本纪）来看，应与上述《太祖高皇帝本纪》同属一个系列，属早期纂修的本纪。诚如是，则书中所写“大清”国号当与《太祖高皇帝本纪》一致。③ 乾嘉以后装潢成帙的本纪，满文题名中不用汉语借词“ben gi”，改用意译的“da hergin”这一词语了。④

既然可以如此分写，依照上文所述ᡩᠠᡳ ᠶᠣᠸᠠᠨ（dai yowan）即大元的书写形式，将ᠠᠮᠪᠠ ᠴᡳᠩ（amba cing）或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即大清书写为ᡩᠠᡳ ᠴᡳᠩ（dai cing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特别是ᠴᡳᠩ（cing）字用于国号，其内涵应该是丰富的，但在满语中它竟然不是一个固有实词！在蒙语中，虽有“诚毅”的意思，但用作国号似乎也不合适。因此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它只能是汉语“清”的音译借词。

再次，“蒙语说”关注蒙古文化对满洲人的影响，强调满洲人吸收蒙古文化的深度和广度，却忽视了清太宗时期出现的“去蒙古化”的趋势。不可否认，清太祖时期，蒙古文化对女真人的影响较大，女真人较多地吸收了蒙古文化如官爵制度等。随着金国势力的强大，清太宗时期以后，特别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与发展，推广女真（满洲）语言文字的使用，提倡以服饰、骑射、语言为核心的满洲旧道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蒙古人的地位不像以前那样尊贵，蒙古文化也开始被满洲文化所取代了。例如：崇德元年（1636）六月初六日，皇太极谕曰：“沙金者佛法也，嗣后，勿言之为沙金，以我国语说之为‘发芬’。……‘道喇密’一词为蒙语，嗣后，无论书之言之，概禁用‘道喇密’一词，皆用‘阿尔胡达密’一词。外藩归降蒙古使者，勿称‘额儿钦’，若来进牲畜财物，即称之为‘来朝进牲畜财物’，若来告事，则谓之‘来奏言’。内外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等互派之使者，则谓之‘额儿钦’，亲王、郡王下遣使者往贝勒、贝子等处，亦谓之‘额儿钦’。未封王之大小贝勒、贝子等之使者，若来亲王、郡王处馈送诸物，则不称‘额儿钦’，谓之‘馈送之人’。”⑤ 而此前于四月二十三日，封“墨尔根戴青贝勒为和硕睿亲

---

① 满文《太祖本纪》，上下卷。嘉庆二十四年十月钞本。按此钞本系内藤湖南于 1905 年在北平购买之书，现收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。

② 李德启编、于道泉校：《国立北平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》，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合印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第 47—48 页。

③ 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满文本《世祖章皇帝本纪书》和《圣祖仁皇帝本纪书》残本各一册，因现在正值搬移当中，不提供查阅，故具体情况，容当后补。

④ 陈捷先称：“台湾现藏的‘本纪’书名，满文则均作‘da hergen i bithe’（请参看附图二）。按满文 da 意为‘原、本’等；hergen 是‘字’的意思，有时也作‘记录’一类字义解；‘bithe’是‘书’。”（陈捷先著《满文清本纪研究》，明文书局印行，1981 年，第 15 页）陈先生所谓 hergen（字）还原为满文则为ᡥᡝᡵᡤᡝᠨ，经核查，系ᡥᡝᡵᡤᡳᠨ（hergin）之误。案ᡥᡝᡵᡤᡳᠨ（hergin），意为“纪”。（《五体清文鉴》卷 5，政部，政类）显然，陈先生太疏忽大意了。

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，1990 年，第 1497 页。

王，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为和硕豫亲王”，[1] 同属此类，只不过转向汉文化罢了。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借用一个蒙古语词汇作为国号呢？

综上所述，简而言之，“大清”国号并非源自蒙古语。

三、“汉语说”之新证

一般认为，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国号源于汉语，是汉语“大清”的音译。早年探讨清太宗改国号为“大清”的原因、从汉文化角度解释汉语“大清”国号的学者，基本不考证其词源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所谓“大清”是汉语国号，根本没有必要考证。有的学者虽有考证，也言简意赅，绝不多费笔墨，如金启孮指出：“‘清’应是‘明’的同义词，有与‘明’比美之意。从太宗改元‘崇德’可为旁证，‘崇德’与‘崇祯’亦有比美之意，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，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。”[2] 近年以来，有学者著书立说，将“汉语说”发扬光大。[3] 应该说，这些作者视野开阔，善于宏观叙述，其论著内容较为全面系统，结论也是可信的。只是缺乏直接材料，论据稍嫌不足，还不能令人信服。

稽考中朝文献记载，可找到一些较为直接的材料，能为“汉语说”提供诸多有力证据。今试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如下：

（一）朝鲜《李朝实录》的有关记载可资为证。皇太极建号“大清”之事，除清朝臣民外，朝鲜是最早知道的国家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四月十一日，朝鲜春信使罗德宪、回答使李廓参加了清朝文武百官为皇太极恭上“宽温仁圣”尊号的典礼，当“圣汗率满、蒙、汉诸贝勒、大臣等拜天行礼”时，因“拒不叩拜”[4] 而“倍受困横”。[5] 十五日，罗、李二人启程回国之际，清廷大员龙什、马福塔交付“大清国汗”致朝鲜国王的书三封，[6] “封缄甚固”，罗、李二人“欲据例开见，则两将坚执不从，驱出”。行至“十里河堡，然后始得拆见”。缘“书面称号及书末印文既与前书体有异”，“辞意悖慢，不敢赍来”，在通远堡下榻时，“暗置于杂物中，而原本则誊写以上”。二十六日，朝鲜君臣得知“其书称大清皇帝，称我国曰尔国云云”。[7]

朝鲜文武大臣始则群情激愤，一片哗然，拒绝接受“大清”国号，在其国内仍称之为“金”，继而被迫接受，但称之为“清”。例如：朝鲜仁祖十四年（清崇德元年，1636）六月十七日，朝鲜国王“答金汗书送于湾上，称以檄”，“备局请于檄书头辞勿书清国之号，其后竟依其所称清国而书送”。[8] 毋庸置疑，在朝鲜君臣看来，“大清”显然是汉语国号，故省略“大”字，仅以“清”字称呼，以求心理上得到些许自我安慰。

---

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（下），第 1440 页。

② 金启孮：《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》，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编：《满学研究》（第三辑），民族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③ 较为突出者，当属叶红、胡阿祥。其所撰《大清国号述论》一文认为：“大清国号的取义，《满文老档》、《清太宗实录》，以及当时及稍后的明、清文献，都没有任何说明。不过，联系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民族形势，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，复受汉式尊号、用汉式年号、上汉式谥号，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、冠服，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，则汉式国号‘大清’，取义本乎汉族经典，合乎汉族传统文化，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，当是肯定无疑的。”（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0 年第 4 期）这一观点，又见胡阿祥、宋艳梅所著《中国国号的故事》一书（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及其《胜过“大明”的“大清”国号》一文（《书摘》2008 年第 11 期）。

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（下），第 1427 页。

⑤ ［朝鲜］《仁祖朝实录》卷 32，页 23。

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（下），第 1429—1436 页。

⑦ ［朝鲜］《仁祖朝实录》卷 32，页 22－23。

⑧ ［朝鲜］《仁祖朝实录》卷 32，页 30、31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崇德元年十二月，皇太极第二次用兵朝鲜后，朝鲜诸臣或主战或主和，政见不一，各道兵马救援无功，最终朝鲜被迫求和。翌年（1637）正月二十九日，朝鲜主战官员吴达济、尹集被解送清军大营，皇太极喝令“执吴、尹问于庭下”，问曰：“汝等何使败两国之盟乎?”答曰：“我国之于大明，臣事二百年，知有大明，不知有清国，安敢不斥和?我朝之于天朝，以臣事之，今将三百年，义君臣而情父子也。清国僭号遣使，身为谏官，安得不力言斥之乎？此外更无所言，愿速杀我。”① 当此之时，皇太极与在事官员并没有因为“清国”二字提出任何疑问。这说明其国号实为“清”，而“大”字只是赞誉之词。

（二）清代官私著述的相关信息可资为证。有清一代，满洲民族居于统治地位，故其语言和文字分别成为“国语”和“国书”，如《钦定四库全书·御制增订清文鉴·提要》中，凡满文均称为“国书”、满语均称为“国语”。② 由于其国号为清，在汉语中有时也分别称为“清语”、“清话”、“清文”和“清字”、“清书”。这一点，从清代满汉文图书题名就可窥得，此种题名很多，仅举几例，详下表（第二列中，满文书名从略，只列出罗马字母转写的书名，以省篇幅）：

满文书名	汉文书名	备注	
1	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	御制清文鉴	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武英殿刻本。
2	nikan hergen i ubaliyam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	音汉清文鉴	明铎注，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文瑞堂刻本。
3	emu be tacifi ilan be hafukiyar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	一学三贯清文鉴	屯图撰，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静宜斋刻本。
4	manju gisun i oyonggo jorin i bithe	清文指要	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重刻本，又名《清语要指》。
5	manju gisun i uheri isabuha bithe	清文总汇	志宽、培宽等编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。

资料来源：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《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。

上表第三列汉语书名中的“清”字，无疑都是国号。这种以国号指称满洲的情况，在其凡例、正文中也多有表现。例如：清代第一部大型满汉文对照词典《大清全书》的汉文“凡例”中，称满文为“清字”、满文书籍为“清书”。其正文中，将ᠮᠠᠨᠵᡠ ᡥᡝᡵᡤᡝᠨ ᡳ ᠵᡳᡥᠠ（manju hergen i jiha）解释为“清字钱”。③ 又如：清代最具权威的大型分类对照词典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中，ᠮᠠᠨᠵᡠ ᡥᡝᡵᡤᡝᠨ（manju hergen，满洲文字）与“清字”、ᠮᠠᠨᠵᡠᡵᠠᠮᠪᡳ（manjurambi，说满洲话）与“说清话”、ᠮᠠᠨᠵᡠᡵᠠᠪᡠᠮᠪᡳ（manjurabumbi，使说满洲话）与“使说清话”各自相对。④

以上众多的事例，充分说明“清”为国号，源自汉语。如果“大清”是一个外来非汉语借词，不能分成“大”和“清”两个部分，则这些事例中出现的“清”字就无从理解了。试想一想，编纂这些书籍的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国号而乱用一个“清”字呢?

（三）清代较为特殊的两种国号称谓可资为证。在清代，满汉语国号除前述“大清”、“清”之外，还有两种较为特殊的满汉语称谓，即汉语之“皇清”、满语之ᠴᡳᠩ（cing）。

1. 皇清。国号之前，冠以皇字，在清代以前已有之，如明代《皇明祖训》、《皇明经世文编》等书名中的“皇明”即是。有清一代，也有这样的称谓，如《皇清文颖》、《皇清职贡图》、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等书名中的“皇清”即是。清高宗《御制诗集》中，也多次出现“皇清”之

---

① ［朝鲜］罗万甲著：《丙子录》，潘喆、孙方明、李鸿彬编《清入关史前料选集》第二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485—486 页。

② （乾隆）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，《钦定四库全书》“经部十”，“小学类二”。

③ 沈启亮辑：《大清全书》，康熙癸亥（1683）初刻，辽宁民族出版社影印，2008 年，第 5—7、248 页。

④ （乾隆）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卷 7，文学部，书类八；卷 14，人部五，言论类一。

言，如“天造皇清，发祥大东”、“塞外行宫奉神御，皇清威德古谁同”等。① 按汉语，皇者，大也，亦为赞誉之辞。因此，在国号之前冠以皇字，犹如冠以大字；皇明即为大明，皇清即为大清，两者用意毫无区别。

在满语中，与“皇清”对应的术语，或作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即大清，或作ᠠᡳᠰᡳᠨ ᡤᡳᠣᡵᠣ（aisin gioro）即爱新觉罗，例如：《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 ᡳ ᡶᡠᡴᠵᡳᠨ ᡩᠣᡵᠣ ᠨᡝᡳᡥᡝ ᠪᠣᡩᠣᡤᠣᠨ ᡳ ᠪᡳᡨᡥᡝ》（daicing gurun i fukjin doro neihe bodogon i bithe）即《皇清开国方略》、《ᠠᡳᠰᡳᠨ ᡤᡳᠣᡵᠣ ᡥᠠᠯᠠᡳ ᠮᡠᡴᡡᠨ ᡳ ᡩᡠᡵᡠᡤᠠᠨ》（aisin gioro halai mukūn i durugan）即《皇清帝典简明手册》。② 爱新觉罗乃清代皇族之姓，在家天下时代，与国号相对应，也是自然的，不难理解。

既然汉语“皇清”即为“大清”，“皇清”又对应于满语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，则满语中的外来语国号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必定是汉语“大清”的音译借词。如果满语中的外来语国号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源自蒙古语，意为善战之国、战士之国，则其音义都不能与“皇清”对应。这一情况再次证明，大清国号源自汉语而非源自蒙语。

2. ᠴᡳᠩ（cing）。在清代文献中，与汉语国号“清”对应的满语，除前述族称满洲外，还有一种对应语，满文作ᠴᡳᠩ（cing）。例如：《ᠮᠠᠨᠵᡠ ᠨᡳᡴᠠᠨ ᡥᡝᡵᡤᡝᠨ ᡳ ᠴᡳᠩ ᠸᡝᠨ ᡴᡳ ᠮᡝᠩ ᠪᡳᡨᡥᡝ》（manju nikan hergen i cing wen ki meng bithe）即《满汉字清文启蒙》，今有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三槐堂刻本。该书又简称《ᠴᡳᠩ ᠸᡝᠨ ᡴᡳ ᠮᡝᠩ ᠪᡳᡨᡥᡝ》（cing wen ki meng bithe）即《清文启蒙》，又名《ᠮᠠᠨᠵᡠ ᠨᡳᡴᠠᠨ ᡥᡝᡵᡤᡝᠨ ᡴᠠᠮᠴᡳᡥᠠ ᠮᠠᠨᠵᡠᡵᠠᡵᠠ ᡶᡳᠶᡝᠯᡝᠨ ᡳ ᡤᡳᠰᡠᠨ ᠴᡳᠩ ᠸᡝᠨ ᡴᡳ ᠮᡝᠩ ᠪᡳᡨᡥᡝ》（manju nikan hergen kamciha manjurara fiyelen i gisun cing wen ki meng bithe）即《兼满汉字满洲套语清文启蒙》，今有清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刻本。《ᠴᡳᠩ ᠸᡝᠨ ᠵᡳᠶᡝᡳ ᡯᡳ ᠪᡳᡨᡥᡝ》（cing wen jiyei dzi bithe）即《清文接字》，嵩洛峰撰，今有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聚珍堂刻本、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三槐堂刻本。该书又名《ᡳᠯᠠᠨ ᡥᠠᠴᡳᠨ ᠴᡳᠩ ᠸᡝᠨ ᠵᡳᠶᡝᡳ ᡯᡳ ᠪᡳᡨᡥᡝ》（ilan hacin cing wen jiyei dzi bithe）即《三合清文接字》，今有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抄本。《ᠴᡳᠩ ᠸᡝᠨ ᠯᡠᠨ》（cing wen lun）即《清文论》，今有抄本，版本情况不详。③ 由此可见，这种情况自雍正以降延至清末，历时颇久。

这个与汉语国号“清”对应的ᠴᡳᠩ（cing）是何种语言呢？按满语、蒙语，都没有可以用作国号的实际意义。依其读音，它只能是汉语国号“清”的音译，属满语中的汉语借词。这又一次证明国号“清”源自汉语，而非源自其他语言。

综上所述，清朝的国号是“清”，所谓“大清”，无非是沿袭前朝的惯例，在国号前面加了一个“大”字，意在赞美。无论“清”抑或“大清”，均源于汉语。满语中作为国号的ᡩᠠᡳᠴᡳᠩ（daicing）既不是满语固有词汇，也不是源于蒙语的借词，而是汉语“大清”的音译借词。与之相应，满语中作为国号的ᠴᡳᠩ（cing），不是满语固有的词汇，不是源于蒙语的借词，而是汉语国号“清”的音译借词。

---

① （乾隆）《御制诗集》（四集）卷47、卷91。《钦定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按，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一书，阿桂等撰，现有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武英殿刻本。《皇清帝典简明手册》一书，《皇清帝典简明手册》一书，溥伟辑，现有宣统年间抄本。详见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《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③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：《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0112—0118号，第23－24页；第0119、0120号，第25页；第0132、0133号，第27页；第0134号，第28页；第1687号，第382页。